

引 言

浩瀚的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位于亚洲、大洋洲、非洲和南极洲之间。它的面积为 7491.7 万平方千米，东南以通过塔斯马尼亚岛的东南角至南极大陆的经线为界，与太平洋相连；西南以通过南非厄加勒斯角的经线同大西洋分界，南缘向南极洲敞开，北部为陆地封闭。它的主要属海和海湾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阿拉弗拉海、帝文海、卡奔塔利亚湾和大澳大利亚湾。在这些属海和海湾中，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是通往亚洲的大门，红海和波斯湾是插入中东的小道，阿曼湾把阿拉伯海和波斯湾锁住，亚丁湾是红海的咽喉。世人皆知，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又人工开凿了苏伊士运河，把红海和地中海连接起来，辟出了

印度洋和大西洋间的最短航线。而作为天然通道的马六甲海峡，又沟通了印度洋和太平洋，是中东和远东的海运捷径。

从上面所展示的印度洋地理环境，不难看出，它是贯通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要道。从而使它成为世界各大洋中的最早海运中心。

作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虽属太平洋沿岸国家，但对世界最早海运中心的印度洋并不陌生。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中国人就开辟了从中国雷州半岛出发的、沿岸渐进的印度洋远洋航路。中国人已经参与了印度洋的贸易，中国使臣随之也到达了印度洋中的斯里兰卡。1 世纪后，中国人已了解到，从波斯湾出发，由海上可以直通埃及。5 世纪初，巡礼印度的东晋僧人法显航海归来，写下的《佛国记》一书，其价值不仅在佛教上，还在于它是远航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纪实性文献。5 世纪以后，已经有从广州直达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的远洋航路，中国的帆船已越过了印度半岛。7 世纪以后，中国的远洋船队可以直航阿拉伯海与波斯湾，且首次到达红海与东非水域。这说明中国人已开始洲际航行。但航行仍然是沿岸进行的，只是越过暹罗湾口和孟加拉湾口。到 11 世纪，又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的航线。这种远离陆岸、越洋致远的航行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航海技能的熟练和造船工艺的高超。所以导致了 15 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在印度洋上演出了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一幕。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人在印度洋上有彪炳千秋的一页，应该成为中华文明史里不可缺少的篇章。

然而，对我们祖先在远洋航海上的成就，似乎总结不够，宣传不够，大概中国人自己也知者甚微，因此也就难于苟求外国学者了。笔者 1993 年秋受印度历史研究会之邀出访在新德里购得《印度洋史》一书 其中虽有《伊斯兰和中华帝国的影响》一节，但其叙述远远不能反映中国人认识、利用、征服印度洋的作为。于是便萌发要写点中国人与印度洋之类的念头。归来，适逢河南教育出版社来校组约《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丛书》，我便申报了这个题目，并荣幸地被入选。后来正当我构思此书框架时，又迎得了个良机。印度驻华使馆邀请我出席 1994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在印度喀拉拉邦首府特里番德琅 Kovalam 召开的“印度学国际讨论会”。Kovalam 处于阿拉伯海海滨。我亲赴印度洋的属海真是莫大欣慰。在紧张的会议之隙，我目睹了碧蓝海水上的独木舟，汹涌波涛里的捕蟹人。这些生息、繁衍在椰丛中的人们 世代拥抱大海 以海为生。如今收入眼帘的情景 可以在 14 世纪我国的远洋航海家汪大渊著述中找到原版。而最为可贵的是，它为我写《中国人与印度洋》增添了巨大激情。基于这样的思绪，在下榻的宾馆，我面对窗外海上的倒影繁星，拟出了本书的纲目。如下：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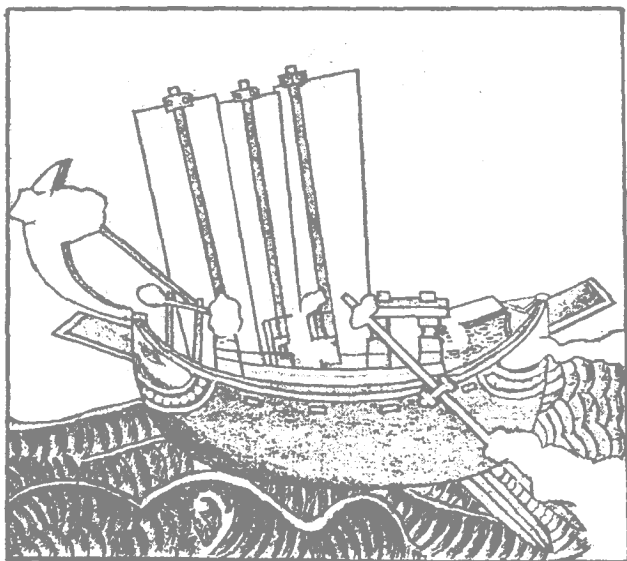
- 一、印度洋沿岸出土的中国文物
- 二、古代中国人笔下的印度洋
- 三、远洋航行与中华文明
- 四、他们的名字与印度洋水长流

一、印度洋沿岸出土的中国文物

在叙述印度洋沿岸出土的中国文物之前 我先向读者介绍两幅图画。一幅是印度阿旃陀壁画上的《中国帆船图》(图一)另一幅是《圣经》插图《东方的商贾》(图二)。

举世闻名的阿旃陀石窟，在今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境内、南印度德干高原温德亚山的悬崖上。它约修建于公元前一二世纪至公元六七世纪之间。洞窟中有石雕佛像和壁画。壁画虽以佛教为基本题材，同时也反映了不少古代社会生活的情况。最难能可贵的是保存了一幅中国的帆船图像。它可以来说明远在六七世纪前，中国人来到南印度开展印度洋的航海业。

在《东方的商贾》这幅图中 我们看到了一艘收起篷帆的阿拉伯天鹅船首的



图一

海船停泊在岸边，码头上有 7 个人物在活动着。仔细分辨画面，从人物的衣著上看，说明了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从人物的举动上看，表现出他们正进行瓷器和丝绸交易。其中站在船前的、左手叉腰、右手捋胡须、身着敞袍、头上箍头巾的，显然是阿拉伯商人。与这个商人对话的是一个双手捧瓷罐、头戴无沿毡帽、身着黑边短袖束腰背搭的西亚人，似乎在兜售他的商品。在阿拉伯人与西亚人之间有一筐瓷器，筐里有一个细颈瓶和大腹瓶，筐外也有一个细颈瓶和小碗。西亚人的后面又有一个包扎头巾、身穿直裰、卷袖露臂、弯腰



图二 东方的商贾

双手捧一个圆形器皿向筐内之姿态，此人大概是阿拉伯商人的伙计。在阿拉伯人的后面还有一个头顶大包、裸露右肩右臂、赤脚行走的人，无疑是商船上的苦力。现在我们把视线再移到画面的另一端，可以看到一个头戴皮帽、身着短袖长袍的老年波斯商人，和一个头戴尖顶帽、身穿宽袖长袍的中国商人一起拉扯着一匹绸缎，似乎在品评质量和价格。而站在中国商人旁边的、头戴尖顶帽、身着直裾，手抱一捆绸缎，腰上拴个布袋和别着一把短刀的人，再加上面前又堆了一个大包和一捆丝绸，可以断言，此人是中国商人的伙计。尽管这幅画的作者和成画时间尚待进一步推敲，但它仍不失为描绘 13 世纪海上交通贸易的一个形象资料。由于画中的交易品是中国的特产：瓷器和丝绸；交易者是中国、阿拉伯人、波斯人。即使交待不出这艘海船停泊港口的名称，也不妨碍这幅画作为中国人参加印度洋贸易的佐证。这正是笔者介绍此画的着眼点。

以下介绍印度洋沿岸出土的中国文物。

世人皆知，古代中华文明的主要标志是有内涵丰富的

传统文化，而千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保存下来的文化遗迹和数以万计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物，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考古学这门科学在国内外的的发展，不仅中国本土发掘出了许多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 而在中国之外的亚洲、非洲、欧洲 甚至澳洲、美洲等地也发现了中国的历史文物。尤其以在亚洲、非洲地区出土大量青瓷，和冠以帝王年号的铜钱最为显著。本世纪 60 年代日本著名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实地考察了在亚洲、非洲地区保存、发现或出土的中国青瓷。他从北非到东非沿岸，又从阿拉伯半岛到波斯湾，再从东地中海到美索不达米亚，后又自印度半岛的西海岸到东海岸，最后进入东南亚。在此基础上，他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终于撰写成了《陶瓷之路》一书（日本 东京 岩波新书 1970 年）^①。他认为这条海上的“陶瓷之路”是中世纪东西文化的接点和东西贸易的象征 可以与陆上的“丝绸之路”即从中国跨越亚洲的沙漠和草原或山脉，通往波斯，然后到达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相颉颃。如今他的这一很有见地的立论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包括中国学术界的认同。就是在他的学术观点指导下 我受到很大启迪。我认为 三上次男先生提出的“陶瓷之路”正是一条跨越印度洋的海上航路。中国人不仅参与开辟了这条航路，还为这条航路的确立和扩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人类在征服印度洋过程中中华文明作出贡献的具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陶瓷之路》 另有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 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体表现。为此，我们应该先了解早在几个世纪前，甚至千百年前落脚在印度洋沿岸的中国文物。现在就由远而近，从印度洋的西面到东面 分非洲东海岸 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印度半岛，东南亚几个地区，分别阐述那里流传或出土的中国瓷器和钱币。

（一）非洲东海岸

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非洲大地上出土了大量中国的青瓷和钱币。在此，只介绍濒临印度洋西海岸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地的出土情况。

1. 埃塞俄比亚 根据考古学家的断定，今天索马里的撒丁岛是中世纪时期的卸货场，穿越印度洋而来的中国青瓷都是从这里集散，尔后通过陆地运往高原各处。所以在今天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相连的通道上，经常会发现中国青瓷。在这个国度里大体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交界处的奥贝尔、奥博巴、德比尔和谢赫巴卡布 4 个遗址，以及鲁加伊、哈拉尔、里马岛、贡德尔共 8 处，出土或发现了较为重要的中国青瓷。这些中国的古瓷，有 12 至 15 世纪的青瓷 还有 16 至 17 世纪的青花瓷。其中值得提出的有两处：一是地处该国西北部塔纳湖（TanaL.）中的里马岛，岛上有一座教堂，教堂内保存了一个精致的中国明代瓷罐。罐内装着顿加尔王的内脏。另一处是位于塔纳湖之北 100 公里的贡德尔宫殿遗址 在这座 17 世纪建造的宫殿遗址中，发现了许多

中国古瓷；在伊亚索大帝统治时期（1682~1706）建造的宫殿墙壁上，镶嵌着中国古瓷，以此作为装饰品。特别是把自己国家的王、侯内脏装在异国的器皿中，只能说明这个国家和人民对中国青瓷的爱慕之心。

2. 索马里 这个国家出土的中国文物主要集中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界处、索马里的南部海域，以及索马里与肯尼亚的边界附近。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界处的博腊马地区有阿姆德、阿巴萨、戈吉萨、哈萨丁尔、达米拉哈德、库尔加布、阿罗加拉布、比约达德拉、德尔比加阿达德、穆萨哈桑和卡巴布等 11 处遗址。上述的这些遗址，经过 1934、1943 和 1950 年三次对其调查和发掘，发现了 12 至 15 世纪，也就是宋元明时期的中国青瓷；以及 16 至 17 世纪，也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青花瓷和少许的釉里红瓷片、浅青白色釉瓷片。南部海域的摩迦迪沙，不仅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青瓷片，还出土了中国钱币 32 枚。另外，该地区又收集到中国钱币 15 枚。出土的钱币自唐国（后唐 923~936）通宝到清文宗咸丰（1851~1861）口宝，也就是说从五代十国的后唐、宋、元、明直到清，各个朝代的中国钱币均有。在索马里和肯尼亚边界附近的基西马尤、拉西尼、库拉、布尔高、汉拿萨、基斯基其尼、基安博尼角以及科伊阿马群岛，都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瓷。古瓷的年代大体以 15、16 世纪的居多。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青瓷不仅从地下出土，还在地面上表露出。如布尔高的一座柱墓顶上安放一个大瓷罐。难怪在本世纪 30 年代，施沃茨说过，从基西马尤到桑给巴尔的整个

海岸 都散布着中国古瓷。

3. 肯尼亚 “从 14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 肯尼亚从中国进口陶瓷的数量等于或往往超过了所有其它国家进口的陶瓷的总和”。这是在肯尼亚作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 在 60 年代曾任蒙巴萨 Fort Jtsus 国立公园园长的杰姆斯·卡库曼 James Kirkman 得出的结论。^②该国发现中国古瓷的遗址大约有 40 个以上。这些遗址大体分布在北部海域的拉姆群岛 (Lamu Is.) 区 从塔纳河 (Tana R.) 至加拉纳河 (Galana R.) 口马林迪 (Malindi) 海岸区 南部海岸蒙巴萨 (Mombasa) 区三个区域内。其中要注意的是拉姆群岛区曼达城 (Manda) 伊斯兰遗址, 它的时代上限可早到 9 世纪。在这里出土了 9 至 10 世纪的越窑青瓷和白瓷, 这是迄今为止在东非沿岸发现的最早的中国瓷器。另外 马林迪海岸区的给地 (Gedi) 遗址出土了一件元代釉里红瓷瓶, 它是东非沿岸目前仅有的一件可复原的釉里红瓷器。并有南宋宁宗时期的庆元 (1195~1200) 通宝和理宗时期的绍定 (1228~1233) 通宝出土。还有, 蒙巴萨区的杰萨斯堡博物馆 馆内展出了许多中国瓷器 可谓是集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之大成, 值得参观访问。

4. 坦桑尼亚 在坦桑尼亚作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家惠勒 (Wheeler. M) 曾经得出结论: “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 正如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 (Kilwa

^② 引自孟凡人、马文宽:《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 10 页, 紫禁城出版社 1987 年版。

D)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片可以整锹地铲起来。”又说“我认为，公平地说，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①坦桑尼亚总共发现过60个以上的中国古瓷遗址，大体分布情况：坦噶地区有22处，滨海区10处，奔巴岛（Pemba I.）及附近岛屿有9处，桑给巴尔岛及附近岛屿主要有4处，另外还有马菲亚岛（Mafia I.）及附近岛屿以及基尔瓦岛各处。在此要指出的是，基尔瓦岛不仅是坦桑尼亚出土中国古瓷最多的地方，也是非洲出土中国古瓷最多的地点之一。同时要引以自豪的是，中国的青瓷已融入非洲的物质文化中。这里和非洲其它地方一样，用中国陶瓷作为装饰，不仅嵌在柱墓上，还嵌在建筑物上。如在马库丹尼遗址中，见到带廊的房子，房子的小圆屋顶上镶嵌了许多瓷碗，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仅存中间的一件大青瓷碗。这里还要提上一笔的是，该岛发现的最完整的一件瓷器，即景德镇产品、元代青白瓷玉壶春瓶。这件元代青白瓷玉壶春瓶出土于胡逊尼库布瓦的宫殿遗址内。不论这个瓷瓶是生活用品，还是鉴赏品，都表明中国青瓷已经深入中世纪非洲的实际生活中。

除了青瓷之外，坦桑尼亚还发现和出土了不少中国钱币。计有四个地点：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桑给巴尔岛、马菲亚岛、基瓦尔岛。除了达累斯萨拉姆发现的那枚铜钱碎片辨不清字迹外，在桑给巴尔岛东南部的卡将瓦（Kajenwa）出土了一个钱币窖藏，约有250枚中国钱，其中

《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17—18页。

除 4 枚唐玄宗开元 (713~741) 通宝外, 余下都属北宋 (960~1127)、南宋 (1127~1279) 各个时期的。考古学家断定这个钱币窖藏的时代在南宋末年。马菲亚岛总共发现过 9 枚中国钱币, 有 3 枚是宋代的, 其余 6 枚情况不明。至于基瓦尔岛,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发现一个 4 枚中国北宋钱币和 127 枚基瓦尔钱共存的钱币窖藏。本世纪初又发现一个钱币窖藏, 其中 1 枚北宋神宗熙宁 (1068~1077) 钱币和 63 枚基瓦尔钱共存。此外, 该岛还发掘出土了 9 枚中国北宋钱币, 以及在海滩上捡拾得 14 枚中国钱币, 多为宋钱, 包括了 1 枚明代钱币。

上面所介绍的仅是濒临印度洋的东非出土中国文物简况。关于整个非洲发现的中国青瓷和钱币, 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可喜的是近十几年来, 中国学者也作了探讨、研究, 并有论述。可阅读《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① 和《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一文。

(二) 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 印度半岛

以上谈了非洲东海岸出土中国文物的情况, 而阿拉伯

孟凡人马文宽著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87 年。

马文宽:《海交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半岛的南端与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隔海相望，根据古代印度洋的航海路线，阿拉伯半岛及波斯湾一带出土中国文物，势在必行。这里仅介绍也门的亚丁、阿曼的苏哈尔、波斯湾的巴林岛和伊朗的古港口斯拉夫等地的出土情况。

1. 亚丁 迄今这里仍是西亚的著名港口。在它附近的卡乌德亚穆赛拉 (Kaud am Saila) 和亚尔哈比尔 (Al Habil) 以及在它东北 56 公里外的海港阿布安 (Abyan) 等废墟中发现了中国的陶瓷。阿布安废墟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是 12 至 15 世纪时国际商品荟萃的地方。上面提到东非索马里的撒丁港是卸货场，而货物正是从阿布安海运过去的。所以，在废墟中残存了大量的中国陶瓷，这些陶瓷的时代属于 12 至 15 世纪的。关于亚丁港瓷器交易情况，14 世纪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Ibn Battuta 1304~1377) 的《游记》^① 中有描述。15 世纪跟随郑和远航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中也提到用中国青花瓷互市。

2. 苏哈尔 它是 9 至 12 世纪的一个繁荣的国际性商业港口。80 年代法国考古学者对这里一座兴建于 13 至 14 世纪的城堡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经过鉴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这些中国陶瓷的时代主要是 9 至 12 世纪初的，还有 18 至 20 世纪的。这说明了 12 至 18 世纪正是苏尔哈国际地位的衰落时期。9 至 10 世纪的陶瓷包括浙江北部的越窑青瓷碎片，和大概出自河北窑、邢窑和定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窑以及南方窑、景德镇等地产的白瓷碎片。另外，还有湖南长沙窑的陶瓷和广州西村窑的瓷碟残片。有关这个城堡遗址出土中国陶瓷的详细情况请参阅程存浩译、（法）米歇尔·皮拉左里著《阿曼苏丹国苏哈尔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一文。

3. 巴林岛 位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波斯湾海面上的巴林岛，虽以盛产石油而著名，然而在卡拉托巴林南 400 公尺的清真寺废墟和附近的海滨上也发现了中国文物。日本学者曾在这里收集到 28 块青瓷片和 58 块青花瓷碎片。根据鉴定，大部分属于 14 世纪后半叶及 15 世纪初的龙泉窑青瓷。另外，在巴林岛采集到的中国陶瓷，还有一些被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收藏着。应该提到的是，美国学者曾经在巴林岛对岸沙特阿拉伯的达兰和附近海岸的卡提夫发现、并收集到中国北宋真宗时期的钱币咸平（998~1003）通宝，以及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和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的铜钱。这些中国文物证实了巴林岛及其对岸的沙特阿拉伯卡提夫地区，是中世纪波斯湾南岸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

4. 伊朗 波斯湾北岸也发现了中国文物。现在由东面到西面阐述，在霍尔木兹岛对岸的大陆，靠近米纳卜（Minab）海岸的卡拉敦（Kalatun）出土了大量优质的宋代陶瓷和一枚北宋铜钱，可能是政和（1110~1117）通宝之类的。出土瓷器被认为是 12 世纪前后的南宋遗物。由米纳卜

海岸往西的塔希利 (Tahiri) 海岸保存着一些小部落 其间的遗址即 9 世纪中叶至 13 世纪时波斯湾最兴盛的港口斯拉夫 (Siraf)。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作过多次的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与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片，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唐邢窑系白瓷和越窑系青瓷。另外，在吉许 (Kish)、喜拉 (Hira)、乌孛拉 (Ubolla)、巴斯拉 (Basra) 等地都有龙泉青瓷碎片发现。

5. 印度半岛 这一地带从孟加拉湾到阿拉伯海，有关巴基斯坦以及嵌在印度洋中的斯里兰卡出土中国文物情况也一并交待。

从波斯湾出来 经过阿曼湾 先到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岸，特别是印度河口的卡拉奇附近，有个曼波尔 (Bhambore) 遗址值得介绍。曼波尔是个废港 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它都兴盛一时，凡渡过印度洋的货物，不管是东面来的 还是西面来的 都要在这里集散。因而 出土中国陶瓷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巴基斯坦考古学者的系统发掘下，这个地区出土了晚唐时期的浙江越窑青瓷、湖南长沙窑釉下彩绘的碎钵片。更多的是宋代瓷片，包括宋初的越窑刻花、广东地区青白瓷浮雕莲瓣纹，以及宋末元初浙江龙泉窑青瓷残片。如果要欣赏这些无声躺在异国他乡地下近千年，而今又重见天日的中国文物，可前去卡拉奇国立博物馆浏览，以及曼波尔遗址博物馆参观。

现在谈谈印度。来到印度的西海岸 先介绍孟买的普林氏奥布威尔斯博物馆 (Prince of Wales Museum)。在该馆一个展室的陈列柜内堆积着大量的中国陶瓷，其中以明代

青瓷和青花瓷为多。后介绍迈索尔州立博物馆，这里展出了两片宋代龙泉窑的青碎瓷、一片白瓷，似乎是产自广东、福建的瓷窑。还有一片南方出产的黑褐釉陶碎片与北宋神宗元丰（1078~1085）通宝粘在一起。这几件中国文物是从迈索尔州钱德拉维利（Chamdravalli）遗址发掘出来的。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断定“大概是宋代带到印度的港口，并一定是被搬运到迈索尔的内地来的。”^①他提到的印度港口当是今天喀拉拉邦的奎隆（Quilon）、柯钦（Cochin）一带。因为宋人周去非在其著述《岭外代答》中明确记载故临今奎隆是中国至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中转站。不仅如此，还有传闻，说在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经常发现中国铜钱。^②以下将谈南印度东面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情况。在泰米尔纳德邦本地治里城附近的阿利卡美德（Arikamedu）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调查和发掘，也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除了一件完整的宋代龙泉窑砧手青瓷钵外，还有龙泉窑青瓷深钵碎片和壶的残部，并见到9至10世纪的越州窑瓷碟碎片。另外，也有磁州窑的陶片。值得指出的一个现象是，某些陶瓷片是与11至12世纪时Cola注犍期钱币共存而且北宋徽宗时的宣和（1119~1125）通宝也夹杂在陶瓷碎片中出土。另外，在本地治里的库利美德（Korimedu）遗址也发现了12至13世纪即宋元时期的陶瓷碎片。在此还应该提出的是，泰米尔纳德邦南端的卡雅尔（Kayal）也出土了中国的陶瓷。

^②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2辑《南海的青瓷》。

从科罗曼德海岸南下，跨过保克海峡，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有印度洋上珍珠之称，处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中枢，理所应当在这里发现中国文物。科伦坡博物馆里不仅陈列了使人感兴趣的、几十件从宋代到清代的陶瓷，还有 1911 年在该国加利（Galle）城出土的一块“郑和布施碑”。碑上见汉文、阿拉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记述郑和去该国时在立佛寺上香布施的情况。^①此外，往康提（Kandy）路上科加拉（Ke-Galla）的底帝加马（Dadiga-Ma）小部落中，有建于 11 至 12 世纪的大佛塔遗迹，出土了 10 至 13 世纪的中国陶瓷。包括龙泉窑青瓷钵残片数件、青白瓷桔形小壶和四脚小香炉的残件，以及越州窑青瓷片、褐釉罐碎片等。还有，该国北部阿努拉达普达（Anuladhapuna）南边的雅巴弗巴（Yapahuva）遗址，经过两次发掘，不仅出土了宋元时代的陶瓷，还有 1364 枚铜钱。这些铜钱绝大部分属于北宋、南宋时期的，也有若干枚唐玄宗时的开元（713~741）通宝和一枚元世祖至元（1264~1294）通宝。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宋时期的面有棱纹的龙泉窑青瓷钵，两个属于上品的宋代青白瓷钵，和三彩系完整的绿釉长壶，以及橄榄色的青瓷小狮子狗头。以上这些在斯里兰卡高原地带发现的中国文物，无疑是由海港运入内地的。而把大量的中国货币作为财宝来储存，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与印度洋海域国家的贸易交往情况。

刘如仲：《郑和与南亚》，《南亚研究》，1981 年 3、4 合期。